

天津地方党史资料



1929—1932

共产党人在天津監獄 中战斗生活紀实

天津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 編

K292.1
3
2



天津地方党史资料

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 战斗生活纪实

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
战斗生活纪实**

天津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4插页 92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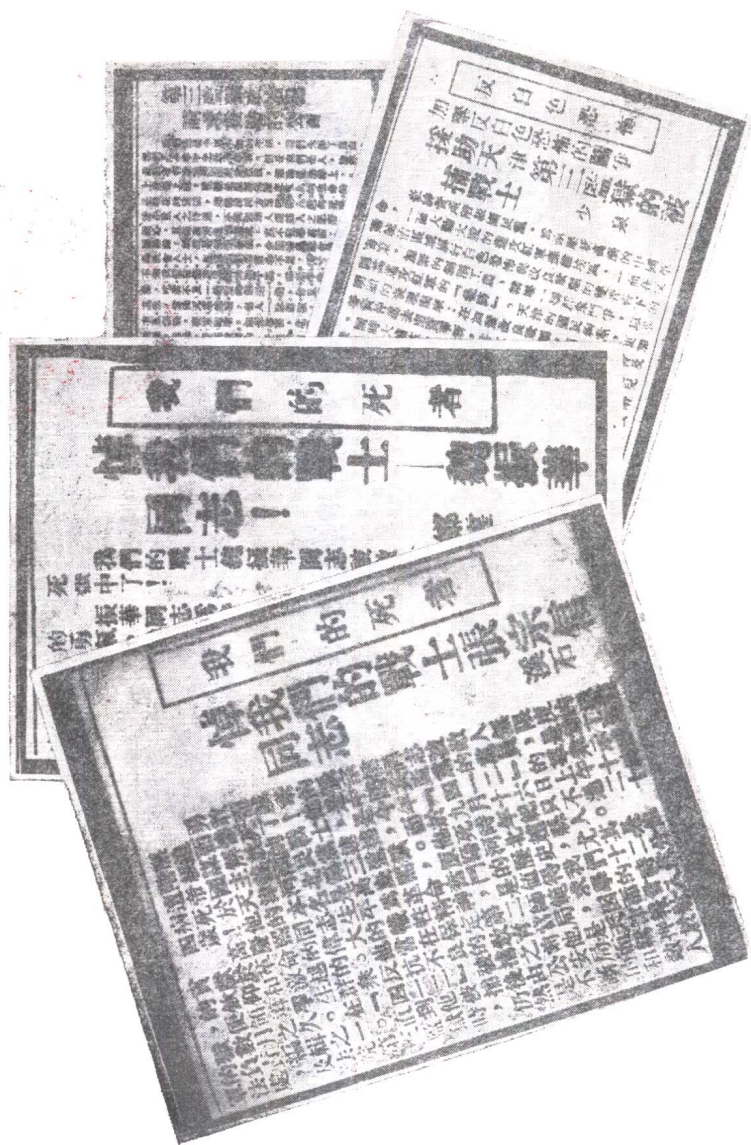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07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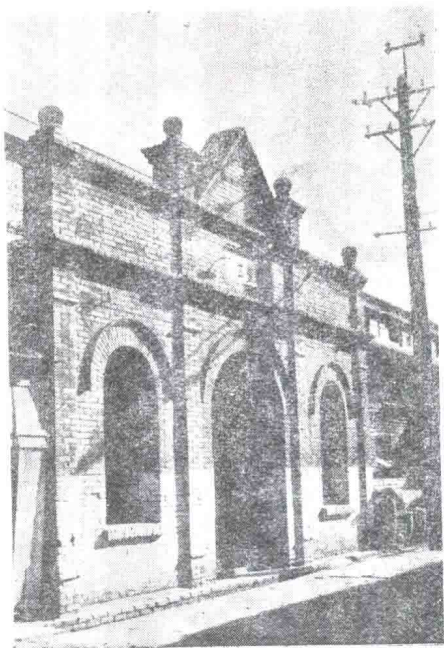
定 价：0.80 元

这是卅年代初胡世彦先生
人在天津第三监狱的平
等史实

高之波
一九八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

《北方红旗》刊登的有关天津河北第三监狱中共共产党人绝食斗争情况报导的部分版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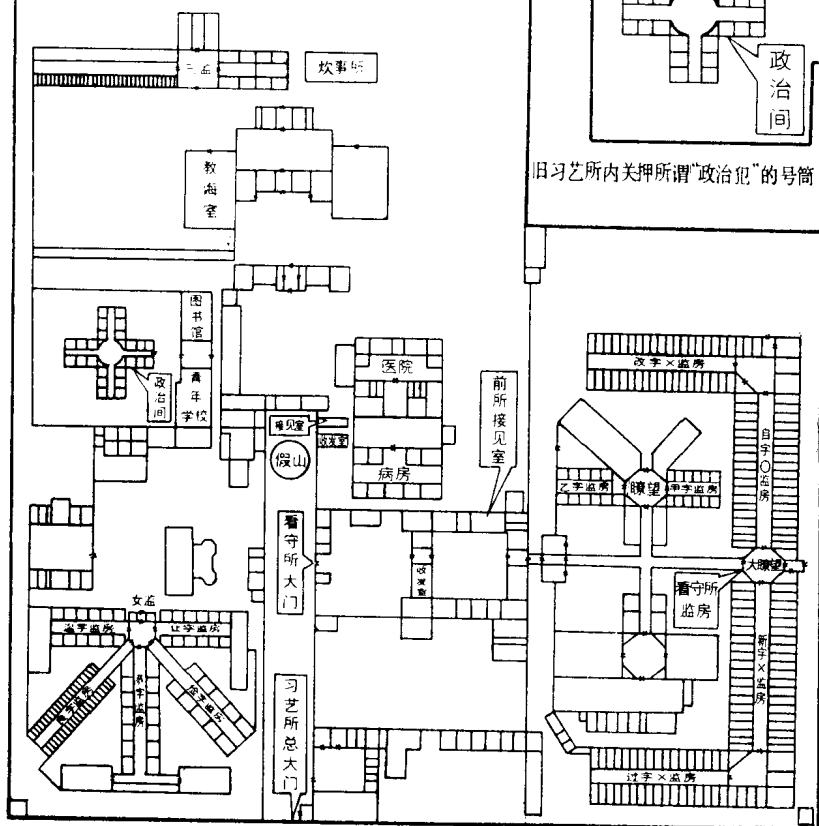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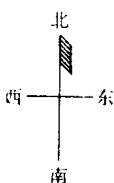


原天津河北第三监狱



狱内牢房通道

解放前习艺所平面图



旧习艺所内关押所谓“政治犯”的符号

目 录

薄一波同志题词

天津“河北第三监狱”中共共产党人

绝食斗争的重要历史意义……………李运昌 (1)

变屠场为战场 变监狱为学校

——狱中生活的回忆……………张明远 (4)

英勇坚持绝食斗争……………李光汉 (45)

我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片断回忆……张友渔 (57)

狱中感怀诗(二首)……………李予昂 (68)

附：一九三〇年在天津狱中两首旧诗的解说

革命气节的严峻考验……………彭 德 (72)

冲破折磨斗志坚……………周黎扬 (79)

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金城 (87)

任凭环境艰苦 斗争绝不息止……………武竞天 (92)

一段难忘的经历……………周铁忠 (98)

“我要参加绝食斗争”……………左振玉 (104)

团结斗争 无往不胜……………司呈祥 (112)

革命者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杜 远 (122)

中共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北方红旗》对三监

斗争的若干报道·····	(137)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三监斗争大事记·····	(149)

后记

天津“河北第三监狱”中国共产党 人绝食斗争的重要历史意义

李运昌

一九三〇年七月，正当蒋、冯、阎在中原地区进行大内战的时候，发生在“河北第三监狱”里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行动。参加绝食斗争者约有一百二十多人。在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策略性，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虐待政治犯，造成魏振华等共产党人死亡，全体政治犯为了抗议敌人对战友的迫害，保护政治犯的生命，于七月二日举行了绝食斗争。敌人曾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威胁利诱，妄图破坏绝食，但是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屈膝投降。最后，在外面党组织的援助下，在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下，迫使敌人向我们屈服了，停止了对政治犯的虐待，接受了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通过绝食斗争，大大锻炼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

进一步坚强了自己的队伍，从而影响了非党群众，他们从心眼里钦佩共产党人的团结战斗精神。有的人在绝食后就要求参加党，有的人在出狱后参加了革命的行列。绝食斗争实际上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了我们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在狱中，许多人自觉锻炼身体，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知识，以便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工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事实证明：凡英勇参加了绝食斗争的共产党员，出狱后，绝大多数都勇往直前，继续斗争，有的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绝食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党支部在狱中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党支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到绝食斗争开始后敌人可能采取的镇压手段，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预先作了准备，同时与外边的上级党组织通了气，使绝食斗争始终得到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绝食斗争中，党及时地发动和组织了新闻考察团到监狱里来调查，把监狱里的黑暗情况暴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迫使敌人不得不撤换了一些罪恶昭彰的监狱人员，这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同时，也宣告了那种认为“在监狱里不能进行斗争”的谬论的破产。

通过第三监狱中绝食斗争这个侧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和创业的艰难。在革命战

争年代里，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有两条战线，主要的一条是在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率领革命队伍，为解放中国人民而战斗；另一条就是白区工作，在敌占区以至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这两条战线的配合，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第三监狱中绝食斗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为党保存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出狱后，在革命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老一辈革命家经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考验。今天还活着的人，都是林彪、“四人帮”刀、枪、棍、棒下的幸存者。许多革命前辈没有牺牲在战场上或敌人的牢狱里，但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这种历史的悲剧绝不允许再重演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应该更加坚定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我们要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继续焕发生命的光辉，帮助、支持青年一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变屠场为战场 变监狱为学校

——狱中生活的回忆

张 明 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简称白区）的党的无数优秀儿女，遭到敌人公开和秘密的血腥屠杀，壮烈牺牲；许多同志被长期关押在监狱中，惨遭非人的折磨。敌人妄图在它的统治尚能勉强维持的情况下，利用所谓“法治”、“人道”的招牌和监狱、反省院的特种屠场、摧残革命志士的肉体，毁灭他们的革命意志，实行比直接屠杀对它更有利的、杀人不见血的监禁政策。为达到其目的，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及对政治犯的“管教”、“反省”等一系列法令和办法，以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机关、法院、监狱、反省院等专政机器，作为执行上述反动政策法规的主要工具。然而，事实与敌人的愿望相反，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也没有被敌人的精神摧残所征服。他们把监狱和反省院当作生死

搏斗的战场，开辟了白区地下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把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屠场变成了锻炼革命者的熔炉和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他们根据监狱、反省院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党保存了一批干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二年，我和许多同志先后被关押在天津的第三监狱和北平的第一、第二监狱，为争取生存权利，反对敌人虐待、残杀政治犯，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四次绝食斗争。这些斗争，赢得了许多重大胜利，也曾遭到严重挫折。回忆这段战斗生活，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当时我党在白区工作的一个侧面。现根据回忆将它写出来，以纪念在监狱中和出狱后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并期望对青年同志有所教益，了解革命先烈们的战斗历程，学习他们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篡党、窃国的需要，竟恶毒诬蔑曾在敌人监狱中英勇战斗过的同志为“叛徒”、“特务”，进行残酷的迫害。不少同志，特别是党和国家一些领导同志，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却惨死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手；更多的同

志因长期被关押，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这一血的教训，应该教育我们子孙后代，让他们牢牢记住，决不允许这类事件在我们党和国家里重演。

团结战斗，争取生存权利

天津是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革命斗争中心城市之一。党的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后改称河北省委）都曾设在这里。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党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进行了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艰苦的斗争中，很多革命先烈，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一九二八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天津后，利用人民对旧军阀的痛恨和不满以及对其反革命面目尚认识不清，抱有一定幻想，实行了比北洋军阀那套更加阴险毒辣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打着“国民革命”的招牌欺骗蒙蔽群众，破坏我党同群众的联系及群众内部的团结；一面大搞白色恐怖，建立和加强其法西斯统治，破坏我党和其他革命组织，镇压群众的革命斗争。加之当时省委在“左”倾思想影响下，不断搞脱离群众的“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左”的行动，以及叛徒的告密、出卖，致使我党和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不

断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入狱，我党的革命活动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我党的顺直省委遭受到一次大破坏，省委以下各级负责干部和一般党员二十余人被捕。这次大破坏，主要是由于曾任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委委员李德贵的叛变。省委对王、李的叛变，虽然及时发觉，采取了紧急措施，并派郭宗鉴同志把他二人处决，但王藻文之妻张健生（与王同时叛变）却带领敌人四处搜捕我党同志。与此同时，敌公安局破获了省委信箱，逮捕了交通员陈涤云，陈在敌人酷刑下，供出了他的住址和一些同志的下落。这两次事件，致使彭真（当时名傅茂公）、郭宗鉴、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金城（当时名靳子涛，狱中名金珍）、詹大权、叶玉文等省、市委负责人和其他党员二十多人陆续被捕。他们先被关押在公安局，遭受特务队使用种种酷刑审讯，移交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后，除在法庭上对敌人违法滥捕、刑讯逼供、无理起诉等，进行控诉斗争，以及在狱中向普通犯人进行革命宣传外，还带领狱中的同志，以各种形式同敌人展开了“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五一”前后，省委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布置“五一”劳动节在全市展开大规模宣传活动，举行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号召工人总罢工。

这次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于是敌人加强警戒，到处搜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其中有十余人是因刘克让（狱中名刘庆瑞，天津第一师范学生，党支部书记）被捕后供出了第二区区委联络点被捕的。这些被捕的同志，也是先由军警机关侦察、刑讯，然后转到法院，关入第三监狱。其中有薄一波、乔国桢（高子香）、刘仁（张福民）、武竞天（刘仁斋）、刘文蔚（赵云生）、刘慎之（刘振邦）、高克林（王子和）、刘汉生（王少卿）、张孟旭（张志良）等同志和我。此外，被关押在这个监狱的还有从河北省一些市、县被捕的同志。从此，我和狱中的战友们一起，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反虐待、争生存斗争的开始

一九三〇年春以前，政治犯与普通犯关押在一起，监狱对犯人使用各种残酷手段，进行虐待、勒索和迫害。狱中伙食十分恶劣，每天两顿小米饭，犯人称它为三合米（发霉的小米、谷子、砂子的混合物），薄薄的一小片咸菜和只有几片菜叶的菜汤。七、八名犯人挤在仅能容纳四、五个人的一间小牢房内，床铺容不下，只能睡在潮湿的地上。刑期在三年以上的，都要带上沉重的脚镣。谁要表示不满或稍加反抗，便遭到肆意打骂和被带上刑具等。每天上下午各放风一